

中国文学史

■ 主编 王文生

隋唐五代文学史



■ 熊礼汇 编著

— 普通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规划教材 —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中国文学史

主 编 王文生

隋唐五代文学史



熊礼汇 编著

普通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规划教材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学史·隋唐五代文学史/熊礼汇编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9. 5

普通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规划教材

ISBN 978-7-307-06678-6

I. 中… II. 熊… III. ①文学史—中国—隋唐时代—高等学校—教材 ②文学史—中国—五代十国时期—高等学校—教材 IV. I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5974 号

责任编辑: 易 瑛 责任校对: 刘 欣 版式设计: 马 佳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24 字数: 429 千字 插页: 1

版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06678-6/I · 347 定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 第一章 隋唐五代文学概说 _____ 1
 - 第一节 隋唐五代的历史概况和士人的文化心态 / 1
 - 第二节 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 / 5
 - 第三节 唐代诗歌的流变及其成因 / 9
 - 第四节 唐代散文的发展和俗文学的兴起 / 14

- 第二章 隋代文学 _____ 17
 - 第一节 隋代文学发展的合流趋向 / 17
 - 第二节 卢思道的诗与骈文和薛道衡的诗歌 / 19
 - 第三节 杨素和杨广的诗歌 / 25

- 第三章 初唐文学 _____ 32
 - 第一节 王绩的诗、赋、文 / 32
 - 第二节 王梵志和寒山、拾得的通俗诗 / 37
 - 第三节 初唐宫廷诗和律诗体制的定型 / 41
 - 第四节 “初唐四杰”的诗、赋、文 / 45
 - 第五节 刘希夷和“吴中四士”的诗歌 / 59
 - 第六节 陈子昂的文学主张和诗、文创作 / 65

- 第四章 盛唐诗歌 _____ 71
 - 第一节 张说、张九龄和王翰、王湾的诗 / 71



- 第二节 孟浩然和刘昫虚、张子容、崔国辅的诗 / 76
- 第三节 王维的诗、文和裴迪、储光羲、常建的诗 / 83
- 第四节 王昌龄和崔颢、李颀、祖咏的诗 / 95
- 第五节 高适和王之涣的诗 / 102
- 第六节 岑参的诗 / 109
- 第五章 李白 _____ 114
- 第一节 李白的生平、思想和诗歌主张 / 114
- 第二节 李白的古诗、乐府、歌行和绝句 / 117
- 第三节 李白诗歌的艺术特色 / 122
- 第四节 李白的辞赋和散文 / 131
- 第五节 李白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 137
- 第六章 杜甫 _____ 139
- 第一节 杜甫的生平和思想 / 139
- 第二节 杜甫的古诗和律诗 / 142
- 第三节 杜甫诗歌的艺术特色 / 149
- 第四节 杜甫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 155
- 第七章 天宝、大历年间的诗歌 _____ 158
- 第一节 元结、顾况和戴叔伦的诗 / 158
- 第二节 刘长卿和韦应物的诗 / 164
- 第三节 大历十才子和李益的诗 / 169
- 第八章 元、白诗派和新乐府 _____ 176
- 第一节 中唐写实诗风的流行和“张王乐府” / 176
- 第二节 元、白诗派和白居易的诗歌主张 / 183
- 第三节 白居易的新乐府和其他诗歌 / 188
- 第四节 元稹的乐府和其他诗歌 / 197
- 第九章 韩、孟诗派和刘、柳的诗 _____ 202
- 第一节 韩、孟诗派和韩愈的诗歌 / 202
- 第二节 孟郊和贾岛、姚合的诗歌 / 210



- 第三节 李贺的诗歌 / 219
- 第四节 刘禹锡和柳宗元的诗歌 / 225
- 第十章 杜牧和李商隐的诗、文 _____ 235
- 第一节 杜牧的诗歌创作 / 235
- 第二节 杜牧的文论主张和他的辞赋、古文 / 240
- 第三节 李商隐的咏怀诗、咏物诗、咏史诗和无题诗 / 244
- 第四节 李商隐的诗歌艺术及其对唐诗发展的贡献 / 253
- 第五节 李商隐的骈文和散文 / 259
- 第十一章 晚唐诗歌 _____ 263
- 第一节 张祜和许浑的诗歌 / 263
- 第二节 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的诗歌 / 270
- 第三节 聂夷中、杜荀鹤等人的诗歌 / 276
- 第四节 司空图的诗作、诗论和韩偓的诗歌 / 281
- 第十二章 唐代古文 _____ 288
- 第一节 萧颖士、李华、独孤及的古文观念和创作特点 / 288
- 第二节 元结的古文主张和创作特点 / 294
- 第三节 韩会、梁肃和柳冕的古文观念 / 302
- 第四节 古文运动和韩愈、柳宗元等人的古文理论 / 306
- 第五节 韩愈的古文创作 / 315
- 第六节 柳宗元的古文创作 / 322
- 第七节 中唐其他作家的古文创作 / 328
- 第八节 晚唐作家的古文创作 / 335
- 第十三章 唐传奇和通俗文学 _____ 346
- 第一节 唐传奇的发展及其原因 / 346
- 第二节 唐传奇的思想艺术 / 349
- 第三节 唐代变文 / 355
- 第四节 话本、俗赋与歌谣 / 358



- **第十四章 唐五代词** _____ 363
 - 第一节 词的起源、发展和敦煌曲子词 / 363
 - 第二节 晚唐以前的文人词 / 366
 - 第三节 温庭筠、韦庄和花间派其他词人的词 / 369
 - 第四节 冯延巳和南唐二主的词 / 374

第一章 隋唐五代文学概说



第一节 隋唐五代的历史概况和士人的文化心态

隋唐五代经历了 379 年，其中隋朝(581—618)历时 37 年，唐朝(618—907)历时 289 年，五代(907—960)历时 53 年。这个时期的文学，唐代文学成就最为突出。

开皇元年(公元 581 年)二月，杨坚逼周静帝让位，建立隋朝。接着消灭后梁(江陵)和陈(金陵)，统一了分裂近四个世纪的中国。杨坚在位，尚能实行一些有力的治国措施，而炀帝(名广)执政后，荒淫无道，倒行逆施，致使民不聊生，社会矛盾日益激化。隋末起义人数之多、分布地域之广，前所未有的，隋很快就在农民起义的讨伐声中灭亡了。

隋代历时不长，但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却有重要意义。文帝、炀帝曾采取过加强中央集权和恢复农业生产的积极措施，在一个时期内使得国家安定统一，为南北文化的交融提供了条件。隋代实行的均田制、府兵制、科举制都为唐所沿用，兴修的水利工程在唐代交通、生产中发挥了巨大作用。隋、唐关系犹如秦、汉关系，隋的统一虽然短暂，却为唐朝的强大、兴盛作了必要准备。

李渊父子是在农民起义军摧毁隋的统治基础以后，在太原起兵，乘机攻入长安，取得政权的。在开国后的三四十年内，大唐相继平定严重威胁国家安全的东突厥、吐谷浑、高昌和西突厥，成为当时亚洲军事力量最为强盛的国家。又，在隋的消亡过程中，李世民看到了农民起义军的巨大威力，因而当权后能记取隋亡的教训。他告诫儿子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



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自鉴录》）出于这样的认识，他积极采用有益于治国安民的建议，有意缓和社会矛盾，制订了一些减轻人民负担、恢复经济的政策，比如实行均田制、府兵制、租庸调法等，还大规模兴修水利，扩大耕地，让过去沦为部曲的人员归田务农。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大唐在开国后一百二十多年中出现了两次经济高涨时期，即“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贞观年间“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贞观政要·政体》）。杜甫即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皆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忆昔》）据洛阳附近出土的唐代粮仓之一含嘉仓砖铭上记载，每窖可藏粮七八千石甚至万石以上，而仓有四百个藏窖。随着农业发展，手工业、交通运输业也兴旺起来。商业性的城市各地都有。北方的长安（面积比今西安市城区大六倍）、洛阳，南方的扬州、益州，都是著名的都市。

在政治上，唐承隋制，但也相应地作了一些调整、变革，如通过重修《氏族志》改变旧有门阀世族的地位，以削弱他们的势力。又开科取士，打破世族垄断仕途的局面，得到了中小地主阶层的拥护。许多庶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感到前途有望，腾跃翱翔，欲有所为，使得国家朝气蓬勃。在思想上，唐对儒、释、道都不排斥。太宗尊孔子为“先圣”，并命孔颖达编写《五经正义》，颁布天下。又派玄奘前往天竺取经，支持他译经。高宗既信佛法，又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亲自注释《孝经》、《道德经》和《金刚经》，刻石以告士人。并将《老》、《庄》列入明经科考试的内容。有唐一代，佛教经文和其他宗教（如景教、摩力教、祆教和伊斯兰教）大量传入中国。不但如此，唐对南亚、东南亚各国和西域各国的文化艺术也是兼收并蓄，为我所用，表现出海含地负般的气度。

这时的唐朝，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受到四邻各国的仰慕。它的影响扩大到今蒙古、中亚、南亚、东南亚、日本一带。波斯（伊朗）、大秦（罗马）通过丝绸之路和唐保持商业往来，甚至居住在撒哈拉沙漠附近的黑人也和唐人有过贸易关系。日本十三次派遣唐使到中国，每次带数百人的学问僧、留学生来华学习，日本迎送唐朝赴日使节六次。来华的学者、僧人和其他人员把唐朝先进的文化、生产技术以及生活习俗带回日本，至今还影响着日本人民的生活。当时各国旅华的官员、僧侣、商人、学者甚多，大都住在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地。

但是，唐王朝在极端繁华中也潜伏着政治危机。唐玄宗在位四十余年，早年励精图治，颇有政绩，后期却一味享乐，政事外交李林甫、杨国忠，内



委高力士。天宝中后期，皇室、官僚、地主竞相兼并土地。朝廷对外频频用兵而又屡打败仗，国力衰竭，天下为之骚然。公元755年11月，安禄山率兵十五万，以诛讨杨国忠为名，从门头沟（今北京市郊）一直打到长安。当时“州县发官铠甲，皆穿朽钝折不可用，持挺斗，弗能亢（抗），吏皆弃城匿，或自杀，不则就禽（擒）”（《新唐书·安禄山传》）。玄宗无奈，逃至成都。安史之乱虽是边将起来向中央夺权，属于统治者的内部矛盾，但也带有少数民族将领和汉族争夺政权的性质。这场动乱延续八年之久，致使生产力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国家元气大伤，难以恢复。到了贞元（785—805）、元和（806—820）时期，唐朝稍有振作，称为中兴时期。但这时河湟一带仍为吐蕃占领，地方军阀割据一方，加之宦官擅权，朝臣中党争剧烈，上层统治者内部争斗激烈。后来，随着中晚唐三大政治痼疾（藩镇割据、宦官擅权和朋党之争）的恶性发展，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也愈来愈尖锐，于是相继出现了袁晁起义、裘甫起义和王仙芝、黄巢起义。黄巢起义历时十年，聚众百万，虽以失败告终，但唐王朝也因此一蹶不振。唐朝末年军阀混战，中国重新陷入分裂。公元907年以后，出现了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十国（吴越、吴、南唐、闽、南汉、楚、荆南、前蜀、后蜀、北汉），直到公元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北宋，中国才又归于统一。隋唐五代这种复杂的社会状况，对这时期士人文化心态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

隋代文士多为南朝、北周士人，其中不少人进入唐代，成为初唐文坛的中坚力量。但随着唐代科举制的实行，庶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大量出现，形成唐代新的士人队伍。新士人队伍的形成，既为政坛储备了人才，又为文坛培养了生力军。故唐代文学创作队伍的主体，是出身庶族地主的士人，他们的文化心态如何，对唐代文学发展的走向影响极大。

从开国到天宝初年（742），历代君王多能励精图治，突出表现是任贤用能，不拘一格；广开言路，从善如流。因而百余年间，国家有一种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受时代精神的鼓舞，初、盛唐士人大多精神振奋，欲有所为。所谓“东风动百物，草木尽欲言”（李白《长歌行》）。他们渴望投身于国家振兴的大业之中，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一方面关注社会群体利益，高唱“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陈子昂《感遇》十九），一方面志在功名，把“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高适《塞下曲》）作为追求目标。他们志向远大，自信心强，以为在那个时代，没有实现不了的理想。李白就说他要“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杜甫也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于是我



们看到，初、盛唐士人多有一种乐观进取的心态。他们或用心科考，或隐于山林，或出入幕府，或漫游天下，或走向边塞，到处寻找踏入仕途、施展抱负的机会。即使久久困顿不遇，也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李白《将进酒》），“乘风破浪会有时”（李白《行路难》）。可以说，关注社会，热心功名，乐观进取，是初、盛唐绝大多数士人共有的文化心态。

从天宝中后期到会昌年间，是唐代士人身经动乱，力图拯世济时、恢复大唐盛世的时期。早在天宝十载（751）前后，不少士人已敏锐地感觉到国家大难将至，忧心忡忡，不能自己。像元结，自天宝六载（747）以后，就不断著文刺时疾邪，揭露朝政败坏和士林中出现的道德危机，甚至不畏忌讳，抨击唐玄宗、李林甫、杨贵妃姊妹以及高力士的倒行逆施，以亡国之诫警谏昏荒惑乱之主。李白目睹安禄山的嚣张气焰，也对国家安危无限忧虑。更不用说杜甫，他在乱前已有不少忧念国事、民生的诗篇。安史之乱的爆发，惊醒了唐代士人对美好理想的憧憬之梦。如岑参，昨天还在说“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今日却叹息说：“自从兵戈动，遂觉天地窄。”（《西蜀旅舍春叹》）纵然如此，士人对国家命运关心之深切，希望国家振兴愿望之强烈，仍有增无减。大乱甫平，就有李华等人从道德文化角度探寻动乱成因的举动，到了贞元、永贞、元和时期，士人不但用多种形式（包括诗、文写作）揭露社会矛盾，强烈要求政治改革，还积极投入各个领域的实际革新活动，即使一再受贬、迭遭打击以至有生命之虞也在所不惜。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会昌、大中年间。可以说，大中以前近百年，对国家中兴怀有希望，热心推动政治变革和参与平定内乱、外患的斗争，是士人共有的心态。

大中以后，唐朝江河日下，中央政府权威性急速下降，几乎丧失了统治国家的能力。而社会矛盾加剧，朝中事变频发，农民起义不断出现，士人痛感国将不国，终因回天无力而嗟叹。由于国势衰微不振，信心丧失殆尽，故晚唐士人多怀有愤世嫉俗而近于怨或避世求乐以掩其悲的心态。

总而言之，唐代士人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关心国家命运、群体利益，也关心个人人生价值，并将二者紧密结合起来。只是随着盛唐气象、乱世惨象、中兴迹象、衰世景象的次第出现，其心态才有相应的变化，而关注社会现实、欲有所为仍为其主导面。

唐代士人文化心态的形成、变化，大而言之，是因“时运交移”而“与世推移”，具体说则还与士人对儒、释、道等诸家思想的服膺和特有的艺术修养有关。前已言及，唐代是一个开放的社会。这种开放，不但表现在君王对“中华”、“夷狄”“爱之如一”的民族政策上，表现在对外来文化的尊重和兼



收并蓄、为我所用上，还表现在士人接受传统思想和外来思想的自由选择上。一般来说，儒、释、道等多种思想都曾对士人文化心态的形成产生过影响，而儒学的影响更具主导性和普泛性。许多士人不单积极用世、自强不息、忧国忧民的人生艺术精神本于儒学，就是讲功利、重兴寄、追求中和之美的审美心态的形成，也源于儒家的处世之道。由于唐人习儒多能屏弃章句之学，强调得其大义、灵活运用，故士人中尚儒而言行背离传统儒学者大有人在。至于外儒内佛，儒、道兼修，或一生受多种思想影响（所谓得志则尊孔、孟，失意则祖老、庄）者，更是屡见不鲜。无论是受道家哲学还是道教宗教的影响，士人们都易形成顺应自然、向往自由、珍惜个人生命的人生观念，和以自然、朴拙、瑰玮为美的审美心态。隋唐佛教宗派甚多，影响最大的是禅宗。禅宗讲众生是佛，平常心是道，讲顿悟见性，见性成佛，讲以心传心，不立文字，讲本源空寂，冥心虚寂，以及开导修行者常用的断喝、机锋一类手法，都对笃信佛法的士人在心性修养、思维方式、审美追求方面深有影响。他如魏徵“尤属意纵横之术”（《旧唐书·魏徵传》），陈子昂“驰侠使气”（卢藏用《陈子昂别传》），李白向赵蕤学纵横术一年有余，且“任侠，手刃数人”（魏颢《李翰林集序》），说明儒、释、道以外的其他思想也曾影响到唐代士人的气质、性情和为人处世的方式。

和各种传统思想从多方面影响士人的文化心态不同，良好的艺术修养主要对士人的审美心态深有影响。唐代音乐、舞蹈、书法、绘画、建筑、雕塑艺术十分发达，许多士人要么本身就是优秀的音乐家、书法家、画家，要么十分热爱艺术，有很高的艺术鉴赏水平。在创作和鉴赏活动中，士人们形成了特有的艺术趣味和审美心态，这些对丰富和深化士人心态的文化底蕴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第二节 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

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求变，是隋、唐文学，特别是唐代文学发展的突出特点，也是唐代文学成就辉煌的重要原因。先唐时期，中国文学无论在理论建设，还是在创作艺术方面，都积累了异常丰富的经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传统。和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为我所用一致，唐代文士十分珍惜这笔文学遗产，充分发掘和利用其宝贵价值，为其创新求变服务。故唐代文学，可以说是先唐历代优秀文学传统发扬光大的结果，也可以说是唐人“会通”、“适变”的产物。唐代文学发展“通”而能“变”，主要取决于两点：一是唐代文士多有因时而变的文学观念，在创作中勇于开拓，推陈出新，不



断地超越前人和时人；二是唐代文士创新求变的做法较为合理，他们是在继承前人优良传统和吸收时人长处的基础上自出变化，而不是在推倒一切的废墟上凌空构建楼阁。观其诗、文发展，莫不如此。

北宋以后，学者论唐诗发展，多言其“变”。如明人王祹禀承其师宋濂之说，即云：

唐初，袭陈、隋之弊，多宗徐、庾。张子寿、苏廷硕、张道济、刘希夷、王昌龄、沈云卿、宋少连皆溺于久习，颓靡不振。王、杨、卢、骆始若开唐音之端，而陈伯玉又力于复古，此又一变也。开元、大历，杜子美出，乃上薄风雅，下掩汉、魏；所谓集大成者。而李太白又宗《风》《骚》而友建安，与杜相颉颃。复有王摩诘、韦应物、岑参、高达夫、刘长卿、孟浩然、元次山之属，咸以兴寄相高，以及钱、郎、苗、崔诸家，比比而作。既而韩退之、柳宗元起于元和，实方驾李、杜，而元微之、白乐天、杜牧之、刘梦得，咸彬彬附和焉。唐世诗道之盛于是为至，此又一变也。然自大历、元和以降，王建、张籍、贾浪仙、孟东野、李长吉、温飞卿、卢仝、刘叉、李商隐、段成式，虽各自成家，而或沦于怪，或迫于险，或窘于寒苦，或流于靡曼，视开元远不逮。至其季年，朱庆馀、项子迁、郑守愚、杜彦夫、吴子华辈，悉纤弱鄙陋，而无足观矣，此又一变也。

——王祹《练伯上诗序》

王祹言唐诗之“变”，有褒有贬，自有所见。不过他所批评的几位晚唐诗人，也“各自成家”，于前人诗风有因有革，更不要说在唐代诗史上振衰救弊、开一代新风者。初唐如“开唐音之端”的王、杨、卢、骆，“尝以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绚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思革其弊，用光志业”（杨炯《王勃集序》）。

他们要用“骨气”、“刚健”疗救“上官体”的“绮错婉媚”之弊，纵然对屈（原）、宋（玉）、枚（乘）、马（司马相如）、沈（约）、谢（灵运）、徐（陵）、庾（信）文风严词挞伐，但他们的“变化成一家之体”，乃是“经籍为心，得王、何于逸契；风云入思，叶张、左于神交”（杨炯《王勃集序》）。其思想导向、文风导向都是其源有自，继承的是他们所选择的文学传统。要指明的是，四杰虽强调继承、弘扬传统诗风中的骨气、刚健之美，但也并没有舍弃当时诗歌体制构建方面的成熟经验。陈子昂略有不同。他的“力于复古”，



是以复古为革新，用汉、魏风骨即建安、正始诗风来扫荡初唐犹存的徐、庾诗风，以端正唐诗发展的方向。虽然对于新兴的近体诗在体制上的长处注意不够，但他用“复古”的形式继承优秀文学传统以推动文学革新，无论思想主张还是思维方法，都对唐代文士深有影响。盛唐如李白，也是一位以改革诗风为己任的诗人。他的革新，也是打着“将复古道”（孟荣《本事诗·高逸》）的旗号，一方面肯定盛唐诗人“乘运”、“跃鳞”的创新活动，同时又强调继承《诗经》的风雅精神和建安诗歌的艺术传统。而在创作中，李白不但广为采用《诗》、《骚》以及建安以前诗歌的艺术经验，而且大量吸收六朝诗歌和南朝乐府民歌中的精华为其所用。杜甫为诗，更是明言“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戏为六绝句》），真能做到“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人之体势，而兼今人之所独专矣”（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正因其能集古今诗人长处之大成，故其诗具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中唐如元稹、白居易提倡新乐府，固然有应政治改革需要的因素，但在新诗风的取向上，显然是远绍《诗经》、汉乐府的艺术传统，而近承元结、杜甫、张籍、王建等人的主张。正因通而能变，故其诗歌理论既有所本，又较之前人所言更为系统和更具时代特色，所作之诗亦与前人作品风貌大异。又如韩愈以文为诗和追求奇险一格，虽有得有失，终属创新之举。前者实学李、学杜而用己之所长，后者用意所在，或如赵翼所说：“至昌黎时，李、杜已在前，纵极力变化，终不能再辟一径。惟少陵奇险处，尚有可推扩，故一服觑定，欲从此辟山开道，自成一家人。”（《瓠北诗话》）柳宗元诗精绝工致，更是兼取《诗》、《骚》、陶、谢之长，而自出变化。晚唐如杜牧，自谓“某苦心为诗，唯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杜牧《献诗启》），可谓特立独行之士，其实，杜牧诗风特色的形式（包括用语特征），与他自觉接受楚骚、汉赋和李、杜诗歌艺术大有关系。李商隐“于诗家别开一洞天，非时贤所能摸索”（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其诗歌革新成就高于“时贤”，也与他善于总结、利用前人艺术经验分不开。不单学“屈、宋”，学庾信、杜甫，还将南朝以来骈文、写作积累的艺术经验用到律诗创作中。纵观有唐一代诗人，守成者少，出新者多，而凡能自成一家或创作成就杰出者，总是在合理继承诗歌艺术传统的基础上创新求变。故唐诗发展虽然新变迭出，却与先唐诗歌的演进有割不断的联系。唐代诗人既是传统的继承者，也是优化者、改造者、开拓者，通过他们的努力，不但带来了唐诗的繁荣，而且形成了内涵更为丰富、积淀更为深厚的诗歌传统。



唐代骈文、散文的发展，也显现出唐代文士文学创作不断创新求变的精神和在继承艺术传统上开拓新局面的特点。唐代骈文革新大家，至少有八位。

一是“初唐四杰(即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他们对初唐骈文的革新，主要是强化其社会功用和改变其风格特征。要求恢复“圣人以开物成务，君子以立言见志”的“文章之道”，使文章“可以甄明大义，矫正末流，俗化资以兴衰，家国繇其轻重”(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启》)，又内含“骨气”，有“刚健”之美，所谓“思下情逸，风云坐宅于笔端；兴洽神清，日月自安于调下”(王勃《山亭思友人序》)。

二是张说、苏頲。“四杰”虽祛初唐骈文“内竭”而无骨力之弊，但言词巧丽，“时带六朝锦色”(陆时雍《诗镜总论》)。张、苏进一步改革骈文，除以经术为本外，还着意吸收东汉、魏、晋散文(特别是包含诸多骈文文体素质者)的创作经验，以散入骈，骈散结合，致力于斫雕为朴，黜浮求实。故其文“颇能以雅参丽，以古杂今，彬彬然，灿灿然，近建安之遗范矣”(杜确《岑嘉州集序》)，既昌明博大，以气势胜，又显得声色道丽，雍容典雅。

三是陆贽。陆贽为增强唐代骈文的实用功能，对其文章体制作了改造。他继承张、苏融散入骈的做法，一不言必对偶，当散则散，当骈则骈；一作对偶的句子未必平仄相间，更多的是以散句双行形式，构成大体相对的“偶句”；一将构成“偶句”的单句加长，且力求朗畅、明白，少用典故。

四是李商隐。李商隐被称为晚唐骈文巨擘，其四六文既具清刚苍劲之气，又语词华澹、色泽浓丽，尤以使事精博、贴切著称。他对骈文的革新，既取庾信的“凌云健笔意纵横”，又学得徐陵的叙事物物之工和陆贽议论的酣畅、灵动，且将陆贽深情绵邈、沈博艳丽的诗风引入其中，故其四六文风格独特，以至形成可以称为“樊南四六”式的骈文艺术传统，为宋人所承续。

唐代散文革新的成就，集中表现在中唐古文的勃兴上，而中唐古文的勃兴，正是几代古文家在散文领域不断复古、创新的结果。自陈子昂之后，凡散文革新家都高举复古大旗，明言者如李华谓“文顾行，行顾文，此其与于古欤”(《崔沔集序》)，萧颖士谓“平生属文，格不近俗，凡所拟议，必希古人”(《赠韦司业书》)，柳冕则谓其“意虽复古而不逮古”(《与徐给事论文书》)，他如贾至、独孤及、元结、梁肃等人，都有明确的复古主张。而他们的复古，实质是借对古代散文，特别是儒家散文艺术传统的继承、弘扬，以达到散文革新的目的。韩愈、柳宗元有比较系统的散文革新理论，复古以求变的特点尤为突出。其以儒学为本的古文艺术精神的确立，固然出于应对中唐政治文化危机的需要，也是韩、柳对古代散文艺术传统作选择性接受的



结果。就弘扬儒家散文艺术传统以除时文之弊而言，韩、柳的做法也可以说是对李华、萧颖士、元结等人手法的沿用。至于在古文创作中广泛吸收前人艺术经验为我所用，韩、柳学习的范围较之李、萧等人所留意者要大得多。尤为难得的是，学而能变，在变中产生飞跃，不但起衰救弊，还能超越前人，别开生面。刘熙载说：“韩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成。盖惟善用古者能变古，以无所不包，故能无所不扫也。”（《艺概·文概》）其实，韩愈散文革新的成功，不单是在集八代之成的基础上自出变化，所“集”之“成”，还包括八代以前的散文艺术传统和唐代骈文革新的艺术经验。

文学的发展离不开创新求变。唐人创新意识强，又不舍弃优秀的文学传统，尽量吸收有益的艺术经验为我所用，故其诗、文创作新变迭出，促使唐代文学一次又一次走向繁荣。

第三节 唐代诗歌的流变及其成因

唐代文学空前繁荣，诗的成就最高。清人彭定求等编的《全唐诗》收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诗人有二千三百余家。今人陈尚君编订的《全唐诗补编》（包括王重民、孙望、童养年编的《全唐诗外编》和陈尚君辑纂的《全唐诗续拾》）收唐诗六千余首，诗人有一千多家。作者包括皇帝、官吏、文人、僧侣、道士、歌妓、商贩等各个阶层的人物。唐人诗以情为主，但唐代各种社会事件、风俗人情以及一些极为琐细的生活内容，在唐诗中几乎都有反映。可以说，唐诗是唐代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全面而又生动的历史记录。

唐诗的发展历程，可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阶段。初唐指从高祖武德元年（618）到玄宗开元初年（713）近百年的时间，盛唐指从开元初年到代宗大历初年（766）五十余年的时间，中唐指从大历初年到文宗开成初年（836）约七十年的时间，晚唐指从开成初年到哀帝天祐四年（907）七十年的时间。四个阶段的诗歌创作情况大致如下：

初唐诗坛，齐、梁余风犹存。这时的诗人多是南北朝、隋朝的遗老，他们唱惯了旧调子，一时很难改变。虽然也有格调高昂的好诗，但总的看，初唐诗歌仍未能突破宫廷生活的范围。从贞观初年（627）到武后执政时期，前后出现过三批宫廷诗人：第一批是虞世南、褚亮等人，第二批是上官仪、李义府等人，第三批是“文章四友（即李峤、苏味道、崔融和杜审言）”和“沈（佺期）、宋（之问）”。最早对这种诗风提出批评的是魏徵等人，另一位诗人王绩以及以写白话诗著称的王梵志、寒山子等，主要是用作品表现他们对初唐诗风的蔑视态度。真正能与宫廷诗抗衡、对诗歌发展作出贡献的是“初唐



四杰”。他们都是在开国后二三十年出生的，年少才高，官小名大，看不惯淫靡浮艳的宫体诗和富丽呆板的宫廷诗，而“思革其弊”，主张诗要写得“刚健”、“有骨气”。他们用诗写自己的人生感受，写下层生活，扩大了诗的表现范围，使诗开始回到抒情化、个性化的道路。但他们的诗仍然带有齐、梁诗风的痕迹。继“四杰”之后，对齐、梁余风打击最力的是陈子昂。他用复古方式提倡诗歌革新，主张恢复汉、魏风骨，正始之音，以改变“风雅不作”、“兴奇都艳”的局面。其诗骨力刚健，大都具有深切的人生感受和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他的努力为盛唐诗歌的繁荣起到了开路作用。此外，初唐诗人在诗歌体制建设方面也有建树，突出的是“沈、宋”等人将律诗格律定型化，为唐代近体诗创作的蓬勃发展准备了条件。

盛唐，是唐诗大放异彩的时代。诗人们“盛得江左风，弥工建安体”（王维《别慕容潜》）。所作之诗，“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殷璠《河岳英灵集·集论》）。他们歌唱理想，歌唱友情，歌唱祖国的壮丽风光，表现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当然也写出了揭露社会矛盾、反映民生疾苦的诗。盛唐诗体大备，近体、古体流行；多类艺术风格同存，各种诗歌流派争胜；优秀诗人接踵而出，除产生了伟大诗人李白、杜甫外，还有孟浩然、王维、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人。李白继屈原以后，把古代浪漫诗歌创作推向高峰。杜甫用诗反映安史之乱以前和乱中的社会现实，其诗赢得了“诗史”称号。王维、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高适、岑参、王昌龄的边塞诗都独具一格。就诗体言，李白的乐府、歌行，李白、王昌龄的七绝，杜甫的七律，在艺术上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中唐，在安史乱中和大历初年，杜甫的光芒仍然照耀着诗坛，元结、顾况等人也以写实著称。大历中期，诗坛一度不振。“大历十才子”生在乱后，其诗多应酬唱和、流连光景之作。到了贞元、元和时期，国家中兴有望，诗人用诗揭露现实问题，以期引起改革，白居易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他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口号，还写出了《秦中吟》、《新乐府》等抨击社会腐恶现象的诗。这类诗语言通俗，叙事性强，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写乐府诗的还有张籍、王建、李绅、元稹等人。中唐时期可以说是唐诗发展的第二个高涨时期，所谓“诗到元和体变新”（白居易语），流派众多是它的突出特征。和元、白诗派诗风不同的，有“韩、孟”诗派。韩愈诗风雄奇、狠重，构思奇特，想像诡异，用字奇险，往往以丑为美，以文为诗，开创出新的道路。孟郊、贾岛、李贺都具有这种倾向，他们写诗力求意境、构思、语句的新奇。在他们中间，李贺异军突起，其诗瑰丽、新异、风格独